

戲劇巡演、文化評論與政治建構

——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新秧歌運動”興起的歷史條件

熊慶元

[提要] 東北文工團 1946 年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的公演及圍繞其公演所形成的文化討論構成了東北“新秧歌運動”興起的基礎和序幕。東北“新秧歌運動”是對抗戰時期“新秧歌運動”經驗的承續，它在秧歌改造和社會動員方面成效顯著。與抗戰時期類似，東北“新秧歌運動”的興起亦是因應戰爭的歷史條件，其與解放戰爭存在深刻的同構關係。“新秧歌運動”的歷史經驗充分反映出中共在鄉村文化改造方面的藝術想像力，也折射出其關於階級政治和社會關係的理論思考。

[關鍵詞] 解放戰爭 東北文工團 新秧歌運動

[中圖分類號] I05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1-0170-07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東北地區曾興起過一場“新秧歌運動”，其在形式變革和社會動員方面可以說都相當程度地借鑒了抗戰時期的經驗。迄今為止，關於抗戰時期的“新秧歌運動”，學界已形成非常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對解放戰爭時期的“新秧歌運動”則似乎關注不多。因此，本文將聚焦於這一運動，對其得以興起的歷史條件略作考察。

一、1946 年的東北文工團《軍愛民 民擁軍》公演及其評論

解放戰爭時期，對東北“新秧歌運動”的報導、對新秧歌劇的登載主要集中於《東北日報》、《東北文藝》、《知識》、《東北文化》等報刊。其中，對東北“新秧歌運動”歷史發展情況反映得最全面和清晰的是《東北日報》。該報創辦於 1945 年 11 月。僅在其創辦三個多月後，1946 年春節宣傳期間，它就出現過對秧歌劇創演情況的報導。不過，這些報導大多只提到劇碼的名稱和演出的簡況，並未提供具體文本，亦無成文的評論，可見其尚未能形成更大範圍的影響。

解放戰爭時期對東北形成相當影響的首個秧歌劇作可能是由東北文工團演出的《軍愛民 民擁軍》。1946 年 5 月 6 日，《東北日報》第二版左下角以不大篇幅發表《東北文工團公演觀後感》，簡述該團對話劇《糧食》以及音樂節目和秧歌劇的演出，其中就提到“第三個節目是秧歌劇，這在吉林真是一個極新穎的出現”，^①可見在當時的東北，新秧歌劇尚未普及。遺憾的是，此文並未出現該劇劇名，只提到劇中有“王二嫂”這一人物形象。不過，從數日後見報的另一則觀演隨感中我們即可

發現,這齣秧歌劇事實上就是《軍愛民 民擁軍》。當月 13 日,《東北日報》發表又明的《觀劇雜記》,再度提到了東北文工團的演出。據此文來看,東北文工團 1946 年 5 月上半月之前至少先後在吉林、長春等地演出過不下三次,而對又明來說,印象最深的是其秧歌劇的表演。作者在文中寫道:“新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的王二嫂,健康快活,十足地表現了農婦的純潔樸實的性格”,這便印證了我們以上的推斷。不惟如此,《觀劇雜記》一文還特別對新秧歌劇這一形式褒贊有加,並認為“新秧歌劇將要成為中國歌舞劇的本流”。作者飽含深情地寫道:“這民國以來的新聲,將要普遍到中國的每個工廠、礦山、鄉村、學校、商店裡去。假如現在都會哼哼一句半句皮黃、評劇、影詞或秦腔,將來這新秧歌調也會普及起來的,一定會有一個時代,不會唱新秧歌調便算不得時髦。”^②

東北地區“新秧歌運動”後來的歷史發展表明,這樣的期許並不虛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說東北的“新秧歌運動”即是由東北文工團及其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的不斷公演所肇始。“東北文藝工作團曾在海龍、磐石、吉林、長春一帶巡迴演出多次,頗受各地群眾歡迎。在長春演出後,即轉赴四平前線勞軍”,^③全團於 1946 年 5 月下旬抵達哈爾濱,遂在當月 28 日至月底招待文化界、教育界及社會各界,在哈爾濱舉行公演。此次演出仍採用了該團傳統的三大節目,即話劇《糧食》、音樂表演及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反響熱烈。^④而隨著東北文工團的巡迴演出,《糧食》和《軍愛民 民擁軍》等經典劇碼也在東北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哈市此次演出後,周小卿迅即發表《觀東北文藝工作團的演出》一文簡述觀感,^⑤而止怡則專門撰文評論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⑥其中,止怡的文章頗值得一提。該文作者在指出秧歌劇形式上的靈活性與演出上的經濟性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同時特別提到了秧歌劇對“眉戶調”的採用,並進而由它在音樂和語言上的“地方色彩”問題引申到其與東北語言的差異,這種提法在此前對東北文工團的公演及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的相關評述中似不曾見得。歷史地來看,東北“新秧歌運動”的興起確實與東北文工團之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不斷的公演有關,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前者恰是由後者所引出的,而在這一過程中,止怡的這篇文章多少帶有先期的某種轉折意味。因此,在展開進一步的歷史敘述之前,我們似有必要先對止怡此文所蘊含的一些要點略作說明。關於這篇文章的“轉折”意義,我認為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理解。

第一,這篇文章是自東北文工團公演以來所出現的相關評論文章中第一次單就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所寫的。從 1946 年東北文工團公演話劇《糧食》、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和音樂節目以來,相關的評論性文章基本都帶有綜論的色彩,其文題也多冠以“觀感”等詞,蕭鳴的《東北文工團公演觀後感》、又明的《觀劇雜記》和周小卿的《觀東北文藝工作團的演出》皆是如此,且在文章的內容上對公演三大組成部分的著墨也相對均衡。不過,又明的文章略顯特別,作者在文中著重強調了秧歌劇的演出尤其令他印象深刻並對這一藝術形式大為盛讚,但就全文結構來看,其對話劇和音樂的評論在篇幅上與對秧歌劇的評論也仍是大致相當。這些評論中只有止怡的文章是專論《軍愛民 民擁軍》和秧歌劇藝術形式的。這實際上表現出視角的轉換,即這是解放戰爭初期東北文藝人士第一次將關注的中心從東北文工團整體的公演節目轉移到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而事實上止怡此文也是 1946 年 5 月發表的評論中僅有的一篇將公演的某個具體節目抽離出來單論的文章(這一時期並未出現單獨評論《糧食》和音樂表演的文章)。此其一。

第二,止怡此文不但把評論的重心從“公演”轉移到“秧歌劇”,並且在談及這一藝術形式時還特別提到了秧歌劇產生與發展演變的歷史情況。這也是此文獨有的特點。其他幾篇評論大多僅停留於簡述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相關的文本內容,只有《觀劇雜記》還另外涉及秧歌劇具體的藝術形式特點——“採取了民間歌舞的形式”,^⑦但它們都未延伸到對秧歌劇這一藝術形式歷史形成

過程的關注。《關於〈軍愛民 民擁軍〉》一文則不同，它不但將評論視角從綜論“公演”聚焦到專論“秧歌劇”，同時，它也提到了這一藝術形式具體的特點——“它是綜合民間戲劇、音樂、秧歌、小調，以及話劇中的優點，而以表現新的群眾多角生活，為廣大人民服務作為其目的底一種新的戲劇形式”，這一描述雖較《觀劇雜記》一文更為具體，但兩者的內容顯然是基本一致的。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止怡之文對秧歌劇藝術特點的理解同《觀劇雜記》存在根本的差異：後者只是籠統地提到秧歌劇之“民間歌舞的形式”對作者的觀感所造成的“震驚體驗”，其評價仍落在“形式”本身，但止怡對秧歌劇這一藝術形式的理解則是放在秧歌劇“形式構成”的歷史語境中加以處理的，即他看到的是秧歌劇這一形式真正的“歷史性”。這從他文章的評述方式即可見出。首先，止怡開篇便說“新秧歌劇，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新文藝方向的產物”，而在文章第二自然段一開始他緊接著就寫道：“這種形式的戲劇，在各個解放區，特別在陝甘寧邊區經過三年多的努力實踐與發展，它不但已經成為解放區中一切革命戲劇工作者的光榮事業，而且進一步發展成為廣大解放區中，千百萬群眾自己的普遍而蓬勃的群眾運動”。在這裡，作者先是強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文簡稱“講話”）之於秧歌劇“形式”生成之重要的政治意義，繼而又將這一政治意義放在整個“講話”之後延安及解放區文藝運動的歷史語境中來加以說明。因此，這就不但凸顯了秧歌劇“形式”之特殊性，並進而點出這一“特殊性”的政治意涵，同時藉由“歷史的”追述也將解放戰爭時期演出的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同它得以誕生的原初的歷史語境建立起了歷史的勾連（作者在文中也提到“《軍愛民 民擁軍》是新秧歌劇運動中的一個初期作品”）。^⑧這種“歷史的勾連”乃是蘊含深意的，因為從《關於〈軍愛民 民擁軍〉》後文的相關表述即可知道，止怡以“講話”之於延安此後文藝活動的政治意義始，並承以對秧歌劇形式的“歷史性”的強調，其最終乃是要在承托抗戰時期秧歌劇之“延安經驗”的基礎上“召喚”出創造東北自己的“人民藝術”的願景和可能（其中當然包括解放戰爭時期秧歌劇的創演和“新秧歌運動”的勃興與展開）。明乎於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何以止怡在此文最後要從秧歌劇的“地方色彩”引申到其與東北語言的差異這個問題了。

止怡的文章將評論的視角從“公演”轉至“秧歌劇”並在具體論述中強調秧歌劇藝術形式的“歷史性”與“政治性”，使得此後綜論“公演”的評論文章對《軍愛民 民擁軍》的文本及秧歌劇這一藝術形式投入了更多的關注，對它們的著墨也明顯增多。此即止怡一文“轉折”意味的第三個方面。止怡的文章發表後，對東北文工團的公演進行評論的文章主要有孟來的《觀東北文工團演出小感》和羅立韻的《一點感想——看東北文工團演出後》等，尤以前者較具代表性（兩篇文章分別發表於1946年6月2日和6月3日）。孟來發表於6月2日的這篇文章對秧歌劇的態度頗有意思。他首先聲明《軍愛民 民擁軍》“是老解放區的事實，而以新秧歌劇的形式演出，我對這些都沒有意見”，但他接著卻說“我只是嫌它有些太散漫，……因此它就不緊湊不熱烈”。可接下去作者並未進一步說明該秧歌劇“散漫”的具體表現而對之給予批評，相反，此文的文氣卻再度轉回：“不過這幕劇應該特別注意的是，它是一個新秧歌劇，是偉大英明的人民領袖毛主席所指示出來的文藝道路，這種藝術形式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結合的，正因為有這種血肉的關係，老百姓才高興來觀賞它，來表演它，這種形式不但把戲劇從根本上能夠改造成為群眾的，而且在創作上，它能夠使廣大的人民群眾來參加，使一切舊的民間藝人來參加，真正的能夠使藝術從少數人創造、少數人欣賞中解放出來，走向集體藝術的方向”。由此可見，孟來雖對《軍愛民 民擁軍》具體的文本頗有微詞，但對秧歌劇這一藝術形式還是持肯定態度的。而與之前的綜論性文章相比，孟來此文分給秧歌劇的評論篇幅明顯增多，更重要的是這種評論的方式同止怡的文章基本是一致的，即也是重在強調秧歌劇這一“形

式”的“政治性”和“歷史性”。不僅如此,我們發現孟來在此處所做的這種“強調”,其最終也是通向對創造東北自己的“人民藝術”的“召喚”：“我們應該感謝東北文工團的出演,啟示我們正確的文藝方向,這是為人民的藝術方向,我們應該意識到,並非是老百姓不能夠創造他們自己的藝術,而是人民沒有翻身。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著東北人民從政治、經濟、文化,一切建設上來翻身,我們可以想像到,不久這塊荒涼的東北大地上,也將要像關裡解放區一樣的開出燦爛的文藝花朵的。”^⑨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闡述,我們發現,從止怡《關於〈軍愛民 民擁軍〉》一文在《東北日報》上發表開始,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新秧歌劇創演及其由此發展為一個文藝運動的歷史進程似已初萌。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把止怡的文章與孟來的評論放在同一個歷史節點來考察。發表於1946年6月2日的孟來的文章實際上是寫於三天前的5月30日(此文在《東北日報》發表時,其最後的落款是“五月三十日在中蘇友好協會文化部”),其寫作時間亦即止怡之文的發表時間。這也就是說,從1946年5月初《東北日報》初現對東北文工團公演的評論文章開始,經過該團不斷在各地進行演出(每演必有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近一個月後,東北的文藝界已基本接納了“秧歌劇”這一文藝形式且同時將其視為在“這塊荒涼的東北大地上”訴諸人民翻身、構建自身“人民文藝”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後,以《東北日報》為代表的東北報刊對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的討論開始漸趨消歇。1946年6月12日,《東北日報》登出有關東北文工團公演的一則啟事,稱該團的表演節目在話劇《糧食》、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之外新增了三幕話劇《血債》。^⑩隨後《東北日報》對東北文工團公演的評論文章便有相當部分集中於介紹和討論話劇《血債》,很少再有文章論及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而就在《東北日報》登出上述有關東北文工團公演節目調整的啟事的當天,同一份報紙也報導了黑龍江軍區宣傳隊連日公演秧歌劇的相關情況。^⑪自此以後,東北在文藝實踐層面的“秧歌劇”創演活動便開始明顯增多。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們在相當程度上似乎可以認為,1946年上半年東北文工團輾轉各地對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的公演以及以《東北日報》為代表的東北解放區公開出版物對該團公演與秧歌劇的評論構成了此後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新秧歌運動”得以展開的一個基礎和“序幕”。

二、1946年中期東北文工團戲劇巡演的政治意涵

上文對1946年東北文工團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的公演及圍繞此劇展開的評論做了簡要的梳理和說明。在展開進一步的歷史敘述之前,我們在此似有必要先回答兩個問題:第一,東北文工團為何要集中在1946年的5、6月間進行巡迴公演並以話劇《糧食》和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等文藝作品作為其演出的代表性節目;第二,對《軍愛民 民擁軍》的文本及秧歌劇這一文藝形式的評論又為何會在5、6月之交時出現上述“轉折”。

這兩個問題實際上與東北解放戰爭初期軍事和政治的歷史變化有關。首先,東北文工團集中在1946年的5、6月間進行巡迴公演並以話劇《糧食》和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等文藝作品作為其演出的代表性節目,可以說同這一時期中共在東北開展擁軍勞軍運動有很大關係。1946年5月3日,《東北日報》發表社論《掀起廣泛的擁軍勞軍運動》,三日後,該報即出現了最早評論東北文工團公演的文章《東北文工團公演觀後感》。而從該團公演的節目來看,除音樂表演外,《糧食》和《軍愛民 民擁軍》的內容皆與“擁軍愛民”的主題相關。擁軍勞軍運動在這一時期的開展有其現實的軍事/政治背景。《東北日報》5月3日的社論一開始就提到“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破壞停戰協定,重新在東北開始大規模的內戰,我民主聯軍被迫進行自衛戰”,在經過數月奮戰後最終“保衛了東

北的和平,取得了偉大的勝利”。^⑫歷史地來看,這裡所謂的“大勝利”應與中共對東北重要城市的奪取有關,而這一過程大抵集中發生在1946年4月。

雅爾塔會議討論戰後新秩序時決定由蘇聯出兵殲滅日本關東軍一事在二戰收尾階段付諸實行後,中國東北即由蘇軍所駐。由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東北究竟是由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來接收自然也就成為一個問題。事實上,解放戰爭初期,東北已成為蘇聯、美國、國民黨和共產黨所競相爭奪的要點之一。1946年1月停戰令發佈時,國民政府堅持東北不在停戰範圍,直至3月下旬國、共兩黨方始達成東北停戰協議。不過,3月27日國共簽訂的《調處東北停戰的協議》實際上對國、美雙方向東北增兵的舉動並未有任何改變,蔣介石甚至還在國民參政會上公開宣佈決不承認中共所謂的東北民選政府,這也就意味著和平解決東北問題實際上已毫無可能。鑒於美國借國民政府進入東北以牽制蘇聯而國民政府則借美國反蘇反共的企圖,蘇軍遂於1946年3月29日告知中共東北局其願儘快撤走長春駐軍以便中共軍隊入駐,至4月上旬又敦促中共派主力部隊分控長春、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的城郊,並先派少數部隊入城以備屆時攻奪三市。而進駐長、哈、齊等大型城市也是這一時期中共所必爭之要務。^⑬於是,4月14日蘇軍撤出長春後,中共迅即發動攻勢並在五日內完全佔領該城。隨後,4月下旬,中共又奪取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等城,這樣,東滿、北滿和南滿的一部分便由中共所得,而國民黨僅佔有錦州至瀋陽以北鐵路線及周邊的一些城市。這大抵就是《東北日報》5月3日的社論中所提到的“保衛了東北的和平,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之現實的戰事背景,而東北文工團在這一時期開始連續公演“擁軍愛民”題材的話劇和秧歌劇作品應該說也與這一背景不無關聯。不過,從5月3日的社論後文的表述方式來看,似仍有其他的意味。

這篇社論在提到自衛戰“偉大的勝利”後緊接著寫道:“因此,經過這次保衛和平自衛戰的大勝利,東北人民和民主聯軍的關係是更加密切了,更加血肉相聯了,東北人民進一步認識了人民自己軍隊——民主聯軍的力量,並進一步感覺到武裝起來的必要”,“這次的擁軍勞軍運動,對於我們東北人民,應該看作是一次認識和力量的檢閱,它應該是廣泛的群眾性的運動。在工廠、機關、學校、團體,無論在城市和鄉村,都需要利用各種形式,如開會、講演、座談等,展開廣泛的討論,藉以發揚群眾的積極性和自衛的熱情。”^⑭這些看似尋常的表述實則透出一些重要的信息。

“擁軍勞軍”首先是一種對軍民關係的表達方式,而所謂“進一步認識”、“人民自己的軍隊”則至少表達出這樣的意思:群眾此前對“軍隊”的“認識”存在一定的局限;軍隊在其軍事性功用之外同時亦是具有“人民性”的一種組織形式。從“九·一八”淪陷到“八·一五”光復,東北深陷日寇鐵蹄凡14年之久,群眾對軍隊的負面認識可想而知,而中共在解放戰爭初期接收東北的歷史進程又只是剛剛初啟,作為“外來者”,中共軍隊的“人民性”顯然是需要經過戰爭和時間來加以印證的。而對於東北的群眾而言,中共在幾個大城市頻頻告捷的事實,又有力地促使他們對軍隊的“觀念”發生變化並進而影響他們的“實踐”。因此,所謂擁軍勞軍運動“是一次認識和力量的檢閱”,事實上也表明,這一運動乃是促成軍民“世界觀”變革並在行動上做出回應的一個契機。沒有廣泛的社會參與和群眾動員,戰爭是不可能取得最後的勝利的,因此,社論又進一步強調擁軍勞軍運動“應該是廣泛的群眾性的運動”,須同時“在城市和鄉村”的“工廠、機關、學校、團體”中開展。並且,人民戰爭的歷史條件必然要求自發性的“群眾參與”,這也就涉及宣傳動員的方式必須是多樣而“自然化”的,如此才能“藉以發揚群眾的積極性和自衛的熱情”。所有這一切,其最終的目的乃是為了讓群眾受民主政治和人民戰爭的感召而“進一步感覺到武裝起來的必要”。作為社論而言,《掀起擁軍勞軍運動》在意識形態宣傳方面所涉及的向度和層次可謂是相當清晰和全面,然而它從

另一個方面也折射出這一時期中共在東北軍事和政治方面仍然不穩，亟待更為深入與廣泛的群眾宣傳、社會參與和戰爭動員。

儘管解放戰爭初期在國共爭奪東北的問題上，中共已在相當範圍和程度上進行了政治宣傳，《東北日報》在1946年5月之前曾以一定的篇幅號召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一文所提到的“放手發動群眾”並做出了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指示，試圖借此來加強戰時的群眾工作，但到這年5月初其軍事、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力量仍相對有限。事實上，就軍隊總人數看，這一階段中共在東北的軍隊人數明顯多於國軍。據楊奎松的說法，抗戰結束之後從關內各解放區到東北的中共骨幹部隊僅11萬餘人，至1946年5月短短數月間即已增至30多萬，而國軍此時在東北的近6個軍，其總兵力則大約在24萬。^⑤然而，中共佔據長、哈、齊後，由於其戰線長據點分散，致使兵力無法集中，且大量增補的士兵中又多為員警、偽軍和新兵，並未得到充分的軍事訓練，加之中共長期堅持遊擊戰爭的歷史背景令其缺乏城市陣地戰的經驗，凡此種種，都使它對長、哈、齊等大城市暫時的佔據存有隱患。《東北日報》在5月3日發佈關於掀起擁軍勞軍運動的社論，一方面是基於這一時期中共軍隊“大勝利”的事實以穩定和激越民心，一方面則是希望借助更大範圍、更為廣泛而有效的群眾動員，加強與鞏固對大城市的據有，以為此後東北解放區的建立和發展打下基礎。而倘若我們聯繫當時的歷史狀況來看，1946年5月上旬，也即在該社論發表的這段時間裡，中共在開戰半個月的國共四平之役中已是日見吃緊。至5月18日，中共終因不敵而將血戰一個月的四平這個重要的戰略據點交付敵手。四平淪陷後，中共相繼又失去了長春、吉林等大城市，不得不退至北滿，此後便逐漸轉入廣大的東北農村，開始著手建立東北根據地，而國民黨則由於關內共產黨軍隊的牽制亦不可再派重兵入東北。

1946年，東北文工團之所以集中在5、6月間連續公演表現“軍民關係”主題的話劇《糧食》和秧歌劇《軍愛民 民擁軍》，其不但是與中共這一時期號召開展擁軍勞軍運動的政策性要求相配合，同時更是基於用藝術表演的形式進行文化宣傳以形成自下而上的群眾性的戰爭動員和社會參與的要求和初衷。而在公共輿論的層面，《東北日報》1946年5月下旬開始對《軍愛民 民擁軍》文本的偏重及對秧歌劇這一藝術形式之關注程度的明顯增加則不能不說是同這一階段國共東北戰事的上述重要轉折密切相關的。中共七大以來號召“放手發動群眾”，其中即包含爭奪城市並開展城市工作的重要維度。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共衝突勢不可免，中共一方面力圖與國民黨談判爭取建立聯合政府，一方面也為更有可能即將到來的國共內戰做準備。民族抗爭的消褪與階級矛盾的凸顯，歷史條件的變化顯然令城市爭奪的重要性充分浮現，這一時期國共同時將目光投注東北並由此展開激烈的爭奪戰，相當程度上與東北重要的軍事地理優勢、廣袤的地域版圖、相對雄厚的工業基礎、物資的豐沛以及擁有諸多的大城市有莫大的關係。而自1946年5月中旬四平一役敗後，大城市的相繼失守令中共不得不重新轉入農村，這就使得抗戰時期立足農村、徐圖進取、通過廣泛而有效的社會教育和文化/政治動員形成“群眾性”戰爭參與，以最終奪取城市的文化和宣傳形式的重要性再度顯明了出來。秧歌劇這一藝術形式在該階段獲得更多的關注並特別指出其“歷史性”與“政治性”的意涵，同時又轉而引申到此形式同東北語言和文化的地域性差異，實與上述之重要的“歷史”和“政治”轉折休戚相關。而隨著戰爭格局的變化、中共地域性的轉移以及由此對秧歌劇這一具體而特殊的藝術形式的關注明顯增加，1946年下半年東北地區的“新秧歌運動”便開始興起。

三、結 語

解放戰爭時期出現的秧歌劇，其形式和內容與抗戰時期已有很大的不同。許多秧歌劇作都在

相當程度上採用了東北大秧歌的藝術形式而以描寫土地改革和農民翻身作為主要內容,其中不少重要的作品後來都收於李之華等人編集的《翻身秧歌集》一書。除此之外,隨戰爭發展而從延安到東北的文藝工作者也開始在這一時期進一步探索北方秧歌的藝術形式,《翻身秧歌集》一書的最後就對東北大秧歌的藝術形式及其演出特點(如人物角色、秧歌隊形、秧歌隊組織管理模式等)進行了詳盡的介紹。而張庚所編的三冊著名的《秧歌劇選集》也從1946年開始相繼出版問世,其主要收錄了抗戰時期的一些重要的秧歌劇作且每作附以簡要的說明。這些都是繼周揚等人1944年編輯《新秧歌》後所出版的,在解放戰爭時期短短一兩年的“新秧歌運動”中,其成果不可不謂豐碩。

不僅如此,由於抗戰時期諸般條件限制而在秧歌劇形式探索上所存在的缺陷,在這一時期也開始得到更為深入和系統的清埋與調整,其最突出的方面是秧歌劇的舞蹈形式。隨戰爭遷至東北的魯藝此時開始設立舞蹈系教授舞蹈,其動因之一即與抗戰時期“新秧歌運動”對秧歌舞蹈的重視明顯不足有關。而抗戰時期曾擔任延安保安處秧歌隊編導的胡沙此時也開始在華北聯大文藝學院教授秧歌劇主要的舞蹈形式之一——生產舞。由於文藝工作者當時對秧歌舞蹈缺乏系統和深入的瞭解,這一藝術形式的教授在抗戰時期的學院教育中基本是不存在的。儘管如此,東北“新秧歌運動”同抗戰時期的“新秧歌運動”之間仍有著極其相近的展開形式,在秧歌劇的生產方式上也頗為類似。

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新秧歌運動”都是政黨在中國北部基於固有的在地條件和國際、國內的戰爭時勢而歷史地構造出來的。解放戰爭時期“新秧歌運動”的興起有其自覺的政治建構過程,它是在1946年中期國際、國內的戰爭環境以及政黨政治的博弈條件下,通過主要劇碼的巡迴公演、對公演劇碼及公演活動展開文化評論的文化交互實踐的方式,政治性地形成的。也恰恰是這一點,使東北“新秧歌運動”的興起和發生具有了鮮明的文化政治向度,從而氤氳出解放戰爭時期中國革命政治關乎階級關係、文化認同和社會整合的歷史圖景。

① 蕭鳴:《東北文工團公演觀後感》,長春:《東北日報》,1946年5月6日。

②⑦ 又明:《觀劇雜記》,長春:《東北日報》,1946年5月13日。

③ 《東北文藝工作團蒞哈,今日起開始公演,並將招收團員學員》,哈爾濱:《東北日報》,1946年5月28日。

④ 《東北文藝工作團招待哈爾濱各界公演》,哈爾濱:《東北日報》,1946年5月29日。

⑤ 周小卿:《觀東北文藝工作團的演出》,哈爾濱:《東北日報》,1946年5月30日。

⑥⑧ 止怡:《關於〈軍愛民,民擁軍〉》,哈爾濱:《東北日報》,1946年5月30日。

⑨ 孟來:《觀東北文工團演出小感》,哈爾濱:《東北日報》,1946年6月2日。

⑩ 《東北文藝工作團啟事》,哈爾濱:《東北日報》,1946

年6月12日。

⑪ 《黑省軍區宣傳隊連日公演秧歌劇》,哈爾濱:《東北日報》,1946年6月12日。

⑫⑭ 《掀起廣泛的擁軍勞軍運動》,長春:《東北日報》,1946年5月3日。

⑬ 《迅速佔領長哈齊,確保北滿於我手中》,《彭真文選(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⑮ 楊奎松:《一九四六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北京:《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

作者簡介:熊慶元,揚州大學文學院講師,美國塔夫茨大學訪問學者,博士。江蘇揚州 225002

[責任編輯 桑海]